

红梅今又展新姿

许培基

(苏州市图书馆)

党的六十周年大庆及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召开，真是双喜临门。六中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，通过了《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明确了建设高度现代化、高度民主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，这是振兴中华的伟大的历史转折，展望前程，繁花似锦，怎能不使人欢欣鼓舞呢。

《决议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件，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，充分肯定了我们已经取得的巨大成绩，实事求是地分析了长期以来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危害，是非分明，对人对事的评价恰如其分，确实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的典范，我们又重睹了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。

我们图书馆工作是党的思想、科学、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。三十二年来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，所经历的挫折和失败，在图书馆工作中也有着深刻的反映。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，以党的六中全会的精神为指针，认真回顾我们图书馆事业所走过的道路，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今后工作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，这应该是我们图书馆界大家来做文章的一个大题目。这里，想就我个人在图书馆工作岗位上二十余年的经历，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和体会。

我所在的工作岗位是苏州市图书馆。苏州是以文化历史悠久，园林风景佳胜而举世

闻名的。1914年，在清代正谊书院学古堂藏书楼的基础上建立的江苏省苏州图书馆，位于城南宋代名园沧浪亭畔之可园。至今已有七十七年的历史。在解放前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的三十五年间，虽然有热心于图书馆事业的学者、专家如蒋吟秋先生等惨淡经营，粗具近代图书馆的规模，但事业发展非常缓慢。解放时，全馆藏书不满十万。虽然擅风景园林之胜，然而读者寥若晨星，平均每天到馆人数不满二百，借书只有四十人左右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我还是一名高中生，因故辍学，每天到馆读书约一年之久，环境清静，风景幽美，确实是难得的读书胜地，但盛夏酷暑，岁寒伏腊，风雨晦暝之夕，阅览室几乎空无一人，冷静孤寂，风雨飘摇，确实是解放前我国图书馆事业的真实写照。从我个人来说，却意想不到从此竟与苏州图书馆结了不解之缘。1957年，党派我到苏州图书馆工作，当时已迁到城北拙政园之东侧，虽非昔日池馆，但仍有旧地重临的亲切之感。

从1949年4月苏州解放到1957年，八年之中，通过接收，整顿、改造、发展，苏州图书馆已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凄清冷落的景象了（为撰写此文，我翻检了过去的历史资料）藏书已达二十五万册，向各阶层人民群众发出个人借书证六千余张，全年到馆十六万七千余人次，流通图书十三万册次，举办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讲座，向读者推荐优秀文艺作品的报告会，故事会三十余次。馆舍虽非崇楼峻宇，但也简朴宽敞，已设有

参考阅览室，个人借书处、阅报室，及城中心玄妙观的儿童阅览室，每天借阅图书的各阶层群众，络绎不绝，建立了二十六个图书流动站送书下基层，方便工农群众，确实是社会主义图书馆的一派兴旺景象。在此期间我师汪长炳先生曾任馆长数年，对我馆的基础业务建设作出了很多贡献。现在展阅这一时期的工作计划、总结报告，看到我国老一辈图书馆专家的坚定的事业心，努力赶上时代并对工作负责的精神，闪耀于字里行间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。如在当时，为求事业的进一步发展，曾数度向领导部门提出扩大馆舍另觅新址的建议。我到馆后一年（1958年初）即得以实现迁馆建议，这与前任馆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我馆公园路现址，绿树浓荫环抱中的一座乳黄色的二层洋楼，面积近二千平方米，是当时苏州市内较好的建筑之一。我们的这些变迁，可说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，党政领导方面是很重视图书馆事业的。“从1949年至1957年是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稳步健康发展的时期”，洵非虚语。

然而，从这以后，我国的图书馆事业，包括我馆的工作却走上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，出现了曲折和起伏。这时，左倾思想已经抬头，我到馆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反右斗争。当时，在北京已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图书馆学的批判，影响所及，在全国范围内，也在我馆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办馆思想的批判。现在回顾这一段时期内左倾思想的主要表现是：第一，开始了强调图书馆的阶级性，忽视了图书馆的社会性和学术性；第二，把近代图书馆发展过程中积累形成的一套比较科学的管理方法、技术，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，不加区别地称之为资产阶级的繁琐哲学，任意简化或废除，第三，在批判“今不如昔”“厚古薄今”的口号下，错误地对图书馆事业的历史继承性、文化遗产的积累保存采取了割断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；第四，

由于批判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”而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及图书馆界老一辈专家学者，把红专关系对立起来，歪曲了双百方针。到1958年则又发展了虚假浮夸的不良作风。记得1958年年底1959年年初，我参加了文化学院第一期图书馆长研究班，参与了《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》一书的编写工作初稿中的左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。在研究班结束时，大家写大字报提出1959年的跃进指标，光是图书流通的册次人次的数字之高是惊人的。其实稍具常人见解，就不难看出有些指标明明是虚假浮夸的，但在左的倾向的压力下，对之不但不以为非，而是竞相加码。现在想来，这种左倾幼稚病确实是十分可笑的。当然，这个时期的左的倾向还未占统治地位。1956年中央文化部对公共图书馆工作的指示仍在继续执行。事业仍在发展。如我馆1958年在市科委的支持下，大量增添了中外文科技术书刊资料，建立科技室，逐步开展了科技服务工作。这一时期，在开门办馆，服务大众，便利专家，辅导基层，又红又专等号召下，冲击了图书馆工作中的因循守旧，促进了广大基层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；但在另一方面却忽视了图书馆的基础业务建设，打乱了藏书体系，过分简化了业务工作程序，规章制度只破不立，送书下基层有去无回，大面积开架，无人管理，造成了图书资料的较大损失及工作上的混乱。这个时期的业务统计资料很多是浮夸失实的。这种情况，一直到三年困难时期，才使我们的头脑有所清醒。1960年党中央提出了调整、巩固充实、提高的八字方针，我们也在事业经费大量缩减的十分困难情况下，采取了转向以内部整顿为主的方针，全面清点藏书，清理积压，改编书刊，重建规章制度，很快扭转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。但正如中央指出的，这个时期的后退是被迫的，左的倾向并未彻底解决，而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斗争年讲，月月讲，天天讲，使思想文化战线上

左的倾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。当时，在我馆工作中的主要表现，是在藏书建设及图书流通工作中，推行了禁锢政策，任意扩大提存的范围、乱加技术处理。在发展读者中，片面强调工农兵读者成分，把其他各阶层人民群众排斥在图书馆大门之外，再次造成藏书组织，目录体系及图书流通阅览工作中的新混乱。

追溯这一段历史，可以看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，左倾错误登峰造极，所造成的图书馆事业的严重破坏，濒于崩溃的边缘，也是渊源有自，决非偶然的。十年动乱，十年破坏。从我馆的情况看，馆藏图书的损失虽然不象有些地方有些馆那样怵目惊心，但从1966年到1970年恢复开放的四年间，人员大批下放，书刊订购中断，工作全部停顿，造成的思想上工作上的混乱等严重恶果，至今还要花很大力气去整顿、清理、消除。从1970年到1976年这一段时间内的所谓斗批改，藏书虽有增长，事业也有发展但在流通的图书中充斥了“四人帮”的帮书帮刊当时阅读辅导工作中盛极一时的书评活动，实际上是力图把图书馆变成阶级斗争的工具，专政的工具，是为林彪，“四人帮”的影射史学，阴谋文艺，批林批孔，儒法斗争提供资料，推波助澜的。

前事不忘后事之师，我认为现在党中央总结了建国三十二年来的历史经验，彻底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，对我们图书馆工作者有很大的启示和教育，我们应认真学习，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，分析一下我们工作中有哪些左的倾向和表现，特别是从1958年以后的二十多年中，矛盾交叉，曲折反复，更应实事求是，深入分析，作为今后借鉴，实在是十分迫切十分重要的。

我从事图书馆工作有二十余年了，遗憾的是，从我走上图书馆工作岗位之日，正是左倾路线开始抬头并盛行之时。当时年青气盛，也干了一些蠢事，但文化大革命十年中，

还认为我“左”得不够，还要大加批判，备受折磨，所以对左倾危害更有切肤之痛。由于这些原因，在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目睹图书馆事业春意盎然，一派生机的新局面，确实是感到由衷的喜悦。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，我国图书馆事业前进的步伐如春雷震耳。这五年间，所取得的成就，所开展的活动，是从前所无法想象的。过去，我常常慨叹于十年浩劫的损失，不可挽回，现在则感到来者可追，中兴在望。

以我所在的苏州市图书馆为例，这两年的发展变化之快也远非昔比，全馆藏书已达七十五万，工作人员已增加到四十二人，事业经费逐年增加，今年已达十万，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，1979年市党政领导，批准扩建新馆舍1800平方米，投资26万元，虽然规模不算太大，但是建馆七十七年来最大的一次扩建。在撰写此文时，新馆舍已全部竣工了。我们将调整布局，预计同时可容纳读者七百余人。

从解放以前的风雨飘摇，到建国后前十年的稳步发展，经二十余年的曲折反复，到今天的兴旺发达，不正是我国图书馆事业三十二年的历史的一个缩影么？

从我个人来说，从这个馆的一个普通的青年读者，到壮年成为图书馆战线上的一名普通战士，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虽已年过半百，但为我国图书馆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雄心尚在，赤诚仍炽，壮心未已。

解放前苏州图书馆旧址，可园荷花池畔有铁骨红梅一树，每当初春，新蕾初绽，色泽深红艳丽，为园中春梅之冠，老馆长蒋吟秋先生甚宝爱之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我拜访蒋老先生，谈苏州图书馆的沧桑变化及今后的发展前景，蒋老先生非常高兴，当即挥毫绘铁骨红梅一树以赠，并题字“不畏冰霜雪，花开报好春”足见蒋老先生关心苏州图书馆事业，属厚望于来者的深意。因以为此篇之题名。